

聯合文學

陳芳明文集 1

典範的追求

陳芳明

著

本書從學術研究出發，延伸文學批評，是中國新詩史與台灣文學史之間的浮游心影錄
飄逸的心掙脫政治箝制，終在文學裡靠岸

聯合文學
PDG

典範的追求

作 者／陳芳明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梅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執行編輯／李香儀

視覺總監／周玉卿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 對／林其煬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 話／(02) 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 真／(02) 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 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 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5號7樓

電 話／(02) 29133656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1994年2月 初版

2008年4月 二版一刷 第一次

定 價／350元

copyright © 2008 by Fang-Ming Che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陳芳明文集 1

聯合文叢

414

典範的追求

● 陳芳明／著



第二輯 中國新詩史論

結束與開始 019

都在雨裡沉埋 試論馮至《十四行集》 022

美麗的天亡 淺論握可盈手的《漢園集》 038

風暴孕育的新芽 杭約赫的三冊小詩集 050

那些音色悲哀的歌 七月詩叢時期的綠原 071

記憶與災難 讀痙弦編《戴望舒卷》 086

曲折的沒有出口的路 廢名的詩與詩論 118

盛放的菊花間一多的詩與詩論 163

第二輯 台灣文學史論

典範的追求 楊牧散文與台灣抒情傳統 205

回歸年代誕生的前夜 論洪素麗的詩 212

七〇年代台灣文學史導論一個史觀的問題 222

撐起九〇年代的旗幟《文學台灣》發刊詞 235

虛無主義者的原鄉？小說家筆下的台北人形象 242

王禎和小說中的個人與國家 252

白色歷史與白色文學 葉石濤與藍博洲筆下的台灣五〇年代 280

魯迅在台灣 305

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 340

●新版後記 379

二十年浮游

——《典範的追求》自序

1

中國新詩之甜，曾經浸透過我大部分的青春時期；台灣文學之苦，則深深炙痛我整個中年歲月。在苦與甜之間的浮游，足足耗去我二十年的時光。這條冗長的旅程，發生過背叛、擁抱、憧憬、幻滅，也揮灑過微笑、淚水、苦楚、歡愉。只因穿越了這樣的心靈經驗，我的生命完全改觀。

年輕時代寫下第一首詩時，我從未預見到自己會捲入政治的漩渦，更從未料到自己是如此深刻去領受江湖的恩仇。直到覺悟要如何安排自己的生命道路時，我已在異鄉歷經意志上的無數抑揚頓挫了。從辭鄉到思鄉，從望鄉到歸鄉，協助我完成這段顛簸航行，並且支持我一絲希望力量的，唯文學而已。

我公開承認過，對於文學信仰，自己一度產生強烈的懷疑。那時我才跨過三十歲，已在海外一個偏遠的城市自囚一段時日了。我的動搖，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不僅僅是因為我開始窺見台灣政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我發現了從前所吸收的知識，無非都是用來維繫一個虛幻的國家認同。一如雪崩那般，我先是對過去的史學訓練感到萬分疲憊，繼而對以往熟讀的文學作品也覺得極端邪惡，曾經有過的信心全然失去了。

文學無力感——或者更擴大一點來說，知識無力感——確實充塞了我的體內。我清楚意識到，真正的力量其實是存在於政治權力之中。尤其是見證到許多知識份子遭到恐嚇、誣告、監禁，甚至謀殺之後，我更加發覺學問是沒有用的，根本是沒有出路的。跨入八〇年代初期，好像投入了怒濤洶湧的海洋，我幾乎瀕臨滅頂。後來我會決定去負責一份異議政治刊物的編輯，無非是在尋找一塊求生的浮木。無可否認的，政治誠然挽救了我；彷彿泅泳在黑暗的怒海，終於望見了沙岸。我重新整頓自己的思考，重新瞭望我的過去與未來。政治環境所加諸我的時代危機意識，終於在我內心打造一顆前所未有的靈魂。

但是，靈魂獲得了救贖，並不意味我的思想得到了昇華。當我的學籍與國籍全部被摧毀時，政治無疑給予我一股巨大的力量，足夠讓我掙扎、反省、突破。不過，我要承認的是，政治並沒有帶給我確切的人文方向。我之介入政治運動，畢竟不純然是爲了拯救自己，而是期待如何爲台灣社會探測一些新的可能。在擾攘起伏的政治事件過程中，我不能不嚴肅考慮這樣的問題：政治障礙需要以政治方式來解決；然而，歷史癥結與文學困境，是否也要求以

政治力量來克服？我可以預見政權更替有一天將會完成，但人文的改造能夠隨著實現嗎？

權力的濫用與腐化，在戰後台灣曾經對所有的心靈構成無可言喻的戕害。知識份子不僅向權力人物靠攏，甚且還爲之歌頌讚美；僅有少數的自覺者從事長期的自我放逐。我之所以參加政治運動，無非是要對敗壞的體制進行精神上的抵抗。這樣的行動，對我的生命可以說產生了淨化的作用。做爲一個體制受害者，我更加警覺到，政治對人性的侵蝕是無與倫比的。正因爲如此，我越來越相信，人文的重建必須避開過去政治運動所犯的錯誤。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表的延安文藝座談，一九五〇年國民黨頒布的反共文藝政策，都分別對中國與台灣兩地的作家造成傷害。在政治力量的干涉下，兩個社會裡的文學幾乎都繳了白卷。面對這樣的事實，我不能不思索政治運動之外的人文方向。從這個覺悟出發，我又開始去接觸文學作品。故人重逢一般，我細讀一度淡漠以待的詩、散文、小說。我的文學信念，逐漸擺脫沉淪，而終於醒轉過來。

2

二十一歲那年，我是輔仁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的學生，第一次獲讀中國三十年代的新詩。在那充滿狐疑禁忌的年代，我偷偷在閉室裡低誦何其芳在抗日戰爭之前所寫的作品。以偷窺秘戲的態度去讀新詩，似乎有點猥褻；然而，我當時的心情卻是無上莊嚴。何其芳作品之所以使我著迷，並不因爲它屬於禁書，而是因爲他的詩風顯得敏感、脆弱，暗暗包住一顆熾熱

的心。他的詩，建築了一座精緻複雜的意象之塔，只要開門進入，就會失落在他的情愛迷陣。那樣的詩行，恰好足以誘導年少的我。停留在理想的、傷感的浪漫主義階段，沉湎於慌亂而巫魅的少男情懷，正是我大學時代的最好寫照，並且相當貼切地可以嵌入何其芳的詩境裡。何其芳曾經把他的想像喻為「夢中道路」；這個隱喻若是正確，我在那段時期舒放的煙愁，豈不恰好裝飾了那條道路的景色？

我對中國三十年代新詩的初識，乃是以何其芳的詩集為觸媒。進入研究所後，我又讀了他與李廣田、卞之琳合寫的《漢園集》。從此，我開始廣泛涉獵中國三十年代的其他詩集。從淺顯易讀的臧克家、田間、胡風的作品，到晦澀難解的李金髮、廢名的新詩，我都有過一番品嚐。一九七四年到達西雅圖後，我更有計劃去收集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新詩書目。也為了這個理由，我造訪了北美幾家大學的主要圖書館。每當發現孤本的、絕版的詩集，我必再三撫讀，並影印收藏。可以確信的是，我收藏詩集之多，也許沒有一位台灣的嗜詩者能夠超越。那種狂熱之情，不能不說是從夢中道路延伸出來的。

對於三十年代中國新詩的評價，隨著涉獵日廣而漸漸有了改變。我並不以為何其芳是那段時期的最佳典範，也不認為他是中國社會的最佳心靈。當我能夠鳥瞰縱觀全盤的中國新詩地圖時，何其芳只不過是整個偉大文學運動中的一位詩人而已。與他並列在一起的，還有無數傑出卓越的創作者。中國新文學的成長，其實是受到政治運動的強烈衝擊。何其芳詩風之產生轉變，乃是大時代環境的孕育與錘鍊。許多曾經耽溺於個人情感世界的詩人，都同何其

芳一樣，在戰爭硝煙迫近時，紛紛開門啓窗，投入翻滾的洪流。他們調整了世界觀，同時修正了他們的詩觀，徹底實踐與政治結合的寫實主義。

他們在詩風上的轉變，深深吸引了我。那是文學史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脈動，而這種跳躍的脈動，非常符合我當時的心境。部分是由於我逐漸理解到台灣社會的演化，部分則是由於慢慢意識到自己的精神流亡，我對於文學的要求竟然也焦躁起來。緊繃的意象，急促的節奏，怒張的主題，似乎是三十年代中國新詩的主要特色。我能夠接受如此的風格，毋寧是反映了我的文學態度的逆轉。

我最初寫的兩篇有關中國新詩史論的文章，一是〈記憶與災難〉，在於討論戴望舒作品的落空與落實；一是〈曲折的沒有出口的路〉，專論廢名在新詩史上的評價。對這兩位詩人的褒與貶，全然出自於現實主義的美學召喚。我企圖在分行的文字中，尋出當時中國社會升降的軌跡。明眼人可以看得出，我對戴望舒的晚年詩作特別肯定，這是因為他後期作品已擺脫過去迷離的愛情糾葛，而開始對動亂時代提出強烈的控訴。戴望舒的抗議詩寫得恰到好处，無非是受到早年抒情經驗的薰陶。他沒有像田間那樣嘶聲吶喊，也沒有像臧克家那樣拖泥帶水，而能夠表達得不致過於濫情、粗糙。然而，我對戴望舒的早期風格並不寬容，只因他那時的詩用情太浮、字質太輕，不若後期那樣沉潛紮實。我對早年戴詩的不寬容，還有另外一層考慮，便是認為他過於逃避現實。在「國防文學」與「抗日文學」的口號響遍中國大地之際，戴望舒依舊自陷於抒情詩的鑽營，對於外在現實的改變似乎渾然不覺。當我的詩觀偏向緊張

高亢時，詩的品味無可避免地就出現了很大的侷限。

反映在對廢名作品的評價上，我的侷限性就特別清楚。廢名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寫新詩，也寫小說。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我的注意，主要是因為那時我正熱心閱讀魯迅與周作人的文集。他們兄弟走出的道路，代表中國五四文學的兩種典型。魯迅勇於介入政治與社會，周作人對世事則持保留、淡漠的態度。因為讀了兩位大家的作品，也跟著注意到他們所領導的弟子。兩個集團的人格與風格，誠然構成鮮明的對比。廢名的詩，就在我搜尋的過程中發現的。有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便是我無法避免把對周作人的偏見轉嫁到廢名作品之上。我能夠轉為平心靜氣去閱讀周作人，已是相當晚近的事了。在那段熱衷於議論政治的階段，我嗜愛魯迅遠勝過周作人，所以有一些評價觀點也不免受到魯迅的左右。在很大程度上，我到今天還是對廢名新詩的定位不高。然而，如果重寫那篇批評的話，在尺度上也許會放寬些。

我的品味是那樣狹窄，以致對中國新詩史的觀察也過於偏頗。在日後撰寫的詩評中，我關切的詩人僅止於馮至、聞一多、杭約赫、綠原等人而已。這些詩人都屬於入世的、干涉氣象的，表達方式較為透明、直接，意象經營也較為開朗、易辨。撰寫有關他們的評論時，不免是感情用事的。依照最初的計劃，我希望從二〇年代到四〇年代予以分期討論，進而整理出具有系統的詩史解釋。只是一旦捲入政治運動的漩渦之後，我發現自己的關切漸漸偏離原先預定的方向。

不過，現在回顧那段時期的工作，確實也遭遇不少的障礙。我開始尋找詩集時，中國三、

四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仍在兩岸官方的查禁之列。凡是屬於那一世代的中國詩人，幾乎躲不過任何政治標籤。在台灣一律被視為「附匪作家」，在中國則被打成「右派作家」。權力人物之荒謬，就在於他們有超越時空的能力，規定詩人在舊時代所發表的作品主題，必須符合新時期的政治要求。兩岸的意識形態截然相反，但是對作家追究既往的手法，卻有異曲同工之處。我在那段鷹犬橫行的時期蒐集禁書，自然是對那樣的落伍政策帶有抗議的意味。

客觀的政治環境，迫使我必須在海外的圖書館去探訪失落的詩集。靜謐的書廊、窗外的斜光，往往協助我度過寂寥的時間。坐在一排排書架包圍的桌前，我常忘記自己身在何處。翻閱蝕黃、易碎的書頁，好像是打開一扇記憶的閘門，我走入一個稀有而神秘的世界。意象的牽引，聲音的呼喚，情緒的撩撥，為我創造一個暫時可供安頓的歸宿。不管那圖書館是在北美洲的東岸或西岸，我游移的精神終於得到片刻的慰藉。

3

詩的溫暖是何等微弱，又何等持久。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到洛杉磯編輯一份政治性的週報時，簡直放棄了嗜詩的脾性。對於台灣，我懷有難以抑制的羞愧。那時，有幾位朋友由於政治理由而在坐牢，所有對他們的指控都是毫無根據的。沒有誰能夠為他們辯護，更別說要幫助他們安然出獄。我在海外，既不能伸出援手，也不能使自己釋懷，日子顯得緩滯而漫長。僅有的解脫之道，便是分析政局，並且專心撰寫政論，一種我非常陌生而又不得不去經營的

文體。詩，我熟悉的語言，這時反而距離我最遙遠。

關心了台灣的政治，才使我醒悟到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的存在。台灣文學於我，其實是一個全然荒蕪的領域。第一次捧讀日據時期的詩與小說，我彷彿初識另一種外國文學。從日文翻譯過來的作品，我閱讀時恍然有面對舶來文學的錯覺。這些沉埋在歷史底層的作家名字，都是我生命裡的未知。他們都是在台灣的土地上誕生、成長、耕耘、播種，他們關懷的主題也都圍繞著台灣社會的一切，為何我會感到這般疏離？有生以來，我第一次發現自己是一完全被異化了的書生。我同時也發現，曾經協助我建立世界觀的種種知識，原來就是一種刻意攔領我遠離自己土地的巨大力量；走得遙遠，不容回首。

在求知的道路上，我最後被棄擲在一個錯亂的位置。對於受害的中國作家如馮至、胡風、綠原，我給予同情的瞭解；然而，對於靈魂遭到摧殘的台灣作家如龍瑛宗、吳濁流，我抱持的態度倒是冷漠無比。我能夠恰當掌握間一多、何其芳創作精神的重心，卻不知道如何去撫觸賴和、呂赫若的文學脈搏。如果文學是跨越國界、跨越世代，我為什麼能夠瞭解中國，反而不能認識台灣？我與台灣文學之間的隔閡，絕對不是出自日本語言的問題，而是根源於我長期被灌輸的價值觀念及其延伸出來的偏見。

我接觸日據台灣文學的起點，也是從新詩開始的。爲了研究台灣左翼政治運動，我決定從左翼文學著手，從此便發現了楊華、王白淵，以及鹽份地帶詩人集團。與中國三十年代新詩比較起來，台灣詩人的創作形式與內容，並沒有絲毫遜色。他們表現出來的平民情感與社

會關懷，內斂而含蓄。在殖民地社會，他們的思想、言論受到高度的控制，但是，仍然沒有失去吸收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的機會，同時也沒有斷絕與當時世界文學思潮的聯繫。在視野與格局上，他們的作品早已超越殖民地社會的侷限。

咀嚼了台灣文學的遺產之後，我才瞭解戰後作家的創作生涯與日據時期的文學發展，有極其密切的血緣關係。如果沒有閱讀戰前世代的作品，就難以理清戰後的鍾理和與吳濁流會那樣表達他們的苦悶。要解釋鍾肇政與葉石濤的文學評論，就不能不去追溯日據時期的歷史背景。同樣的，台灣的文學運動與政治運動，呈現的是一種雙軌式的發展。也就是說，這兩種運動的社會背景、理論基礎是共通的，其領導者也往往可以相互易位。這種情況對戰後的文學產生很大的影響，它與政治運動的互動關係，也像戰前那樣密不可分。

以這樣的瞭解為基礎，我更進一步去探索整個台灣史的起承轉合。從史實的印證，我更加清楚台灣文學是屬於抵抗式的、自我放逐式的文學。作家一方面要以文學形式重建台灣精神的主體，一方面又必須以流亡方式逃避對殖民體制的認同。他們未嘗須臾離開過自己的土地，然而，在偏頗的統治之下，他們也很難安身立命。這種內在的精神緊張狀態，迫使他們在表達文學思考時，顯得特別急促。與中國新文學運動相形之下，台灣的文學運動負載了過多的使命。中國作家在三、四十年代的最高目標在於反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台灣作家除了反帝國主義之外，還要解除殖民地的枷鎖，追求一個全面解放的境界。

直到能夠理清台灣史的來龍去脈時，我對台灣作家的作品才有如見故人之感。日據時期

新文學之臻於成熟，乃是政治運動全然遭到禁止後，作家徹底覺悟的結果。失去實踐空間的知識份子，以全副精神貫注於文學創作。所以，在一九三〇年代以後，台灣社會幾乎已看不見任何訴諸具體行動的抗爭。他們被迫以靜態文字的表達方式，繼續發揮抗日的精神。傑出的小說與新詩會出現在一九三〇年代上半期，絕對不是偶然的。我在楊逵、呂赫若的小說裡，窺見當年知識份子隱晦的抵抗意志。縱然他們使用的語言是日文，但作品裡顯現的崇高心靈，恐怕殖民地統治者也不敢正面以對吧。

台灣文學的風格可能稍嫌粗糙，但那也是三、四十年代所有弱小民族的共通性格。就像第三世界文學同樣遇到的難題，台灣作家在語言的運用上有過重重阻撓。戰爭後期，他們使用的漢文遭到禁止，終於被迫能夠寫出流利的日文。但是，戰後初期，日文又受到官方禁止使用，於是他們又必須回到漢文世界。從來沒有一個地區的作家，會經歷如此反覆的語言政策。這說明了台灣文學史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的斷層。戰後台灣作家能夠準確撰寫出色的中文，已是六〇年代以後的事了。龍瑛宗、吳濁流、鍾肇政、葉石濤那一世代，等於是被犧牲了。第二代的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七等生，可視為台灣文學的浴火重生。我對於第二代作家會那樣注意，便是從這樣的歷史觀點來理解的。

我對台灣文學的態度，從偏見發展到偏愛，便是出自這樣的認識。如果在評論台灣作家時有失手之處，那可能是因為我極力要矯正從前的偏見所致。認識自己土地上所誕生的文學，我毋寧是相當遲晚了。我的急切與緊張，只不過是爲了填補過去虛擲的太多時光。以這種心

情來評論文學，自然是不正確的。不過，我至少已警覺了這方面的危機。克服心理上的危機，需要更長久的時間來實踐，我相信是可以做得到的。

4

文學的紀律與尊嚴，絕對不是任何政治主張能夠取代的。在翻滾的政治運動潮流中，我曾經有過一段浮沉。然而，江湖恩仇不致影響我的品味。如同年輕時代那般，對於藝術的純粹與高潔，我不減絲毫崇敬之心。迂迴繞過半個地球，曲折度過半個人生，我終於回到讓我夢裡纏綿的故鄉。台灣的泥土再次恢復了我的文學嗅覺，也使我對文學的信仰更為堅定。走遍了本島、離島，我不能虛偽地宣稱全然沒有幻滅。看到了環境污染與心靈污染日益惡化之際，我的知識份子的無力感總是會滲透全身。但是，另一方面，我又看到那麼多理想主義者仍然在努力工作，放射出近乎爆發式的生命力，我的信心變得無可動搖。憑藉這股生命力，台灣文學的成長必能獲得珍貴的養分。我並不認為台灣人民應該特別感到驕傲，也不認為台灣文學凌駕於其他地區的作品之上。但是，掙脫了長久以來的思想束縛之後，我體認到台灣作家無需再像過去那樣謙遜自卑。他們的生活經驗與思考模式，置於世界文學的脈絡裡，有其無可輕侮的風格，也具備了特殊罕有的魅力，而那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可以輕易取代的。只因對台灣文學懷抱了如此的信心，我曾經被指控過於排斥中國文學。回到台灣後，我常常遭遇到同樣的問題：一位台灣本位主義者，是不是無需閱讀或研究中國作家的作品？每當